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殷墟文化研究

李家耀题



杨宝成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文化研究/杨宝成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2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3268-6

I. 殷… II. 杨…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中国—商代 ②商文化  
(考古学) IV. 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764 号

责任编辑: 王雅红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支 笛

---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287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268-6/K · 237      定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 一

一件偶然的事情往往能决定人的一生道路，我学考古纯属偶然。

青年人好幻想，易激动，兴趣多变。我在中学时代喜欢文学，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还练习写小说、写诗歌。几个热爱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创作小组，还出了一本油印的文学刊物，刊名叫《青苗》。学校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很关心我们，支持我们。从刊物的组稿、编辑到刻写、油印、装订与发行，都是我们自己干，真是全身心投入，扎扎实实忙了一年多。

我就读的中学原先在江阴路，后来搬迁到重庆北路，这里距离上海图书馆仅数百米。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路过这里。那时中学下午一般只有两节课，3点多钟就放学了，课外作业也不多，所以我常去上海图书馆看书。宽敞的阅览室，洁净的环境，肃穆的气氛，每当我从喧嚣的尘世走进这里，心灵就会受到净化。上海图书馆的书很多，借书也很方便。我在这里读了很多的书，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使我受到了文史知识的启蒙教育。

到了高中二年级，历史课换了个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晰，生动易懂，使我渐渐地对历史感兴趣起来。1958年，我高中三年级，正值北京大学建校六十周年，报纸上进行了宣传，还出了一本画册，我是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这本画册深深地吸引了我，加深了我对这所历史悠久、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的了解，驱使我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

报考大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8月中旬，我接到了北京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9月上旬我到校报到，真正成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心中是十分喜悦的。

这一年北大历史系是以系的名义招生的，并未分专业。就在入学报到后不久，一天下午，班上一位干部拿来一张登记表，说是新生要分专业，历史专业分三个班，考古专业一个班，叫大家报名登记。当时系里也没有开个会，介绍一下各专业的概况，就突然叫大家选报专业，使我们这些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毛孩子十分茫然。说实在的，“考古”一词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急忙问负责登记的干部：“什么叫考古？学考古专业毕业出来干什么？”这位干部面

对我的提问，也没有说出什么子丑寅卯来，只是说：“学考古的身体要好，不能色盲，将来要到野外去搞调查发掘。”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好奇心，我生性好动，便把“考古”与风景名胜、文物古迹联系起来。心想学考古就可以到处游山逛景，欣赏祖国各地的秀丽山川、风景名胜。就是这位干部的一句话所引发我头脑中的一闪念，就决定了我的终生职业。“我报考古专业”，我说。

## 二

从1958年9月至1963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的学习生活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9月至1960年下半年为第一阶段，这二年多的时间是在运动中度过的。1958年全国上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北京大学也成为海淀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学校为了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全体新生及部分教师奔赴石景山钢铁厂去大炼钢铁，为完成“1070”而贡献青春，并把教学课堂搬到了钢厂，全年级就上一门课——中国现代史。

1959年全校开展“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960年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已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学校里还是运动不断，口号不断。拔白旗，插红旗，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这种运动不断、批判不断的极左政治，使纯洁、天真、热情的青年学生，思想被搞乱，感情被扭曲，把同学与同学、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搞得很紧张。

那时搞“教育革命”，课堂教学用“大批判开路”。由教师先讲课，以后学生结合讲义（当时北大考古教研室编了一套中国考古学讲义），边学习边批判。我们连考古学基本知识都没有学，就要对老师的教学内容进行批判。批判会上如果不发言，就是态度消极，立场有问题，因此发言内容无非是：“教材没有用马列主义为指导，没有突出阶级与阶级斗争”；“器物排队是见物不见人，搞繁琐哲学”；“教材只介绍宫殿、王陵和贵族大墓，没有写劳动人民如何创造历史”等等。学校领导要求学生在批判中学习，教师在批判中改造。事实表明这场“教育革命”是一场灾难，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学习被取消了，损失最大的是学生。

从1960年冬至1963年7月是我在北大学习的第二阶段。由于党在路线、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全国进入了令人难忘的饥饿时代。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过度的“劳动锻炼”，加上营养不良，北大一部分师生得了浮肿病，其他师生的体质也有所下降。为此，学校党委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实行劳逸结合的口号。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随着整

个国家形势的变化，学术界的气氛也渐趋宽松。教师在课堂上开始能自主地讲授，学生学习的气氛也浓了。应该说我在北大五年，后二年半的学习收获要比前二年半大得多。

尽管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干扰，打乱了考古教研室的教学计划，使同学们的专业知识学习受到一定的损失，但在北大良好的学风影响下，以及考古专业全体教师努力下，我们这一届学生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

大学五年教育，我体会到在两个方面收益最大：一是系统地、全面地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是受到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基本技能与方法的训练。

中国考古学这门基础课分五大段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遵谔先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由杨建芳、张忠培、严文明三位先生负责讲授，商周考古由邹衡先生讲授，秦汉考古由俞伟超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由宿白先生讲授。老师是一流的，教学质量也是一流的。

老师讲课很认真，上课采用课堂教学与实物观摩相结合，课堂上讲一段时间，再到学校的文物标本室及中国历史博物馆去看文物。由于采取概念知识与实物形象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同学们听得懂，印象深，兴趣浓，乃至当时老师讲的许多知识，至今我还能记得。学校里的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北大考古专业十分重视学生的田野考古发掘与室内资料整理方法的训练。

我们这一届学生在校共参加过三次考古实习。

第一次实习是在1959年3月至6月，即我们一年级的下学期。地点选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南台地遗址及元君庙墓地。这次实习是给三年级老大哥当学徒，他们负责发掘，我们负责运土。尽管劳动量很大，一天干下来很累，但在感性知识的学习和发掘技能的训练方面，收获还是很多的。发掘结束后，老师还带我们到古都西安参观了一个星期，先后参观了秦始皇陵、阿房宫、汉茂陵、唐昭陵、汉长安城“王莽九庙”发掘工地以及陕西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等。这一次实习与参观，使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前，学到了不少考古学的感性知识，这对以后数年的专业课学习，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次实习是在四年级的上学期，时间是1961年9~12月，实习地点原先选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我们班三十多个学生加上带队教师的口粮当地无法解决，要让学校从北京运粮食去。学校无能为力，被迫将实习地点改为北京昌平区雪山遗址。该遗址是1960年10月为建新北大而在此修筑铁路时发现的。负责这次实习的有俞伟

超、邹衡、高明三位老师，我们班共分三个学习小组，三位老师各负责指导一个组。整个工地的业务指导及总记录由邹衡先生负责。尽管在实习过程中，工作上和生活上都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困难都一一被克服了。在发掘中老师的教学、辅导非常认真，对学生在田野发掘技术、地层关系的分析、遗迹现象的观察，以及出土文物、文字、图像资料的收集与记录的训练要求很严格。

雪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它包含了雪山一期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时期）、雪山二期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及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既有遗址，又有墓葬。这次实习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田野考古训练。11月中旬田野发掘结束，便转入室内资料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的训练。

到了五年级上学期，即1962年9月至1963年1月，我们班进行了毕业实习。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派往郑州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四个学生分成两个小组。我和彭金章分在一组，负责整理郑州洛达庙遗址1957年的发掘资料，指导教师由贾峨先生担任。实习的内容包括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陶器的分期排队即类型学方法的训练，发掘报告的编写，最后还要收集有关资料，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

在陶器排队快结束时，大约是11月下旬，苏秉琦先生到郑州来检查我们的实习。苏先生是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教授。我们在学校除听过他作的报告外，并未听过他上的课，接触比较少。见他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和作业，心里都有点紧张。苏先生一到我们的住地，首先询问了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和我们谈心，他说话不紧不慢，总是面带微笑，渐渐地我们也就不紧张了。苏先生很耐心地听了我们关于资料整理经过以及陶器排队结果的汇报，检查了我们做的器物卡片。他看得很细，很认真，特别重视我们的陶器排队，并告诫我们应该重视洛达庙出土的陶鬲、陶鼎和深腹罐的研究，这是该遗址出土的主要炊器，数量大，种类多，很有典型性。他要求我们在对陶鬲分型分式时，既要注意口部，更要注意裆部与足部的区别与变化。在苏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在洛达庙遗址陶器分期过程中，又重新将50年代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遗址中所出土的陶鬲、斝、甗、鼎等三足器进行类型学考察，发现原先所分的二里冈上、下层两期中，还有细分的必要和可能，这一看法后来写入了我的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之中。苏先生在郑州呆了五天左右，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和我们一起在仓库里摸陶片。他在摸陶片时，十分专注，十分投入。他不时地告诉我们应观察的某个特征，应注意的某个问题。仓库里很安静，我们全神贯注地观察苏先生的工作方法，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

通过三次考古实习，使我们在实践中学习了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

五年级的下学期，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我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郑州洛达庙遗址的文化分期》，指导教师是邹衡先生。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实践和训练，学生们基本上掌握了从事田野考古、室内整理和课题研究的方法和要领，培养了走向社会后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我本人也从为了“游山逛景”学习考古，到逐渐懂得什么是考古学，怎样才能做好考古工作，直至最后将考古作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事实证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文化大革命”前，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探索，所制定的教学计划与办学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苏秉琦先生十分重视北大考古专业的办学方针的探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尽管学生批判他，他还是在思考北大从办考古专业以来，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1969年2月我和苏秉琦先生被工宣队和军宣队隔离审查，住在考古所西面的一间平房里。一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雪，大家很早就躺下了，但睡不着，苏先生便和我谈起心来。

苏先生说：“北大和考古所都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北大考古专业的办学路线，这一段时间我反思再三。50年代北大考古专业最早开始办的时候，提倡向苏联学习，按莫斯科大学考古专业的模式去办学，包括教学指导思想和课程的开设，都受到影响，结果把我们自己的特色丢了。1958年搞教育革命，‘大破大立’，‘破旧立新’。以后几年经过摸索，我们逐步制定出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案，1961年以后就逐步按这个方案去进行教学的。”

苏先生在回顾了他探索考古专业的办学之路后，希望我谈谈在北大学习的体会，以及对考古专业的教学方法的意见。

我说：“我在北大考古专业学了五年，收获最大的是三次考古实习，特别是最后一次毕业实习。通过实习，我学会了从事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分配到考古所后，一下去就能独立地搞发掘、整理。其次是学校里开的中国考古学五大段基础课，使我们系统地掌握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知识。”

同时我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专业的教学中，最薄弱的是考古学基本理论的讲授，所以学生毕业后只会发掘，搞陶器排队。怎样从考古学的角度去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其方法和手段是什么，我都毕业好几年了，还是不很清楚。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还向苏先生提出，北大考古专业的教师没有很好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进行教学，

没有坚持考古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今天看起来有些是很可笑的意见。

匆匆三十余年过去了，苏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在那一个雪夜里的师生对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苏秉琦先生对待他的学生总是那样亲切、和蔼，谆谆善诱。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学家。他对北大考古专业的建立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新中国考古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 三

我从北大毕业后便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1986年秋调往武汉大学，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一直在安阳队工作，从未换过队。

最初在安阳队的几年，工作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这一切对于我们成长于50年代到60年代的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并不陌生，也未曾畏惧或埋怨。一些来安阳殷墟参观的外地朋友，以及安阳市文化局、外办等常与我们打交道的干部，对我们苦行僧式的生活以及对考古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表示同情与感慨，对此，我们很平静地告诉他们：“干考古就要能吃苦，干长了就习惯了。”

从60年代到80年代，安阳队的工作人员经常更换，比较固定的成员有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和我，再加上1978年调来的徐广德。戴彤心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安阳队的队长，在安阳队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多年，做出了很多成绩。1977年他因家庭困难，调到他的母校西北大学去工作了。如今他已去世，我们都很怀念他。

安阳队的队员们人际关系融洽，学习气氛浓厚。在数名老队员中，数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戴彤心等同志都很有学问，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的实践经验，而且为人敦厚谦逊。在与他们多年的共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几位学长中，我与杨锡璋同志关系更密切些。锡璋于1958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是我的师长。他是无锡人，我是镇江人，可算是老乡。他涉猎广泛，学识渊畅，为人随和、坦率，所以我们很谈得来。自从我在1965年春去安阳参加大司空村发掘以后，我们俩一起去山西永济搞“四清”，回所参加“文化大革命”，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封闭在信明明港军营里清查“五一六”，恢复工作后再次去安阳发掘，直到我调离考古所，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年，相知是很深的。

我和锡璋同志经常一起讨论读书的心得，交流考古发掘中的收获和认识，曾多次合作编写发掘报告、撰写学术论文。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摘引了我



过去发表的有关文章的若干内容，其中有的文章是我和杨锡璋同志合写的。这些文章有：《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的结语部分（《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从殷墟小型墓葬看殷代社会的平民》（《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殷墟发现的青铜铲》（《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2月）；《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在摘引以上文章时，对原著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在这里作一说明。

夏鼐所长的治学与为人在考古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对年轻人非常热情，希望他们多做田野工作，练好基本功。他一贯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要求各考古队必须把田野工作放在第一位，并应不断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他曾明确告诫某些不愿下田野、只愿坐在办公室里搞研究的同志说：在考古所不允许存在一部分人专门搞发掘、一部分人专门搞研究的现象。有一段时间，考古学界流行一种“挖宝”思想，对一般遗址的发掘与抢救不感兴趣，而热衷于挖大墓，企求一挖就挖出个“金娃娃”来。对此，夏所长曾在所内大会上强调指出：衡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水平高低，成绩大小，不是看他挖到什么珍贵文物，因为那是祖先留下来的，而是要看是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安阳殷墟的地下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盗掘文物的活动，历史上早有记载。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的文物盗掘愈演愈烈。大批的珍贵文物被盗掘，并有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在安阳发掘期间我读了一些史书和地方志，也听到了当地老农民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盗墓的故事，从而萌生了研究殷墟盗掘史的想法。有一次夏所长到安阳来调查处理殷墟的文物保护问题，我将这一想法大胆地向他讲了，他听了后很感兴趣，勉励我把这一课题搞下去。他还说：殷墟盗掘的情况在旧中国有典型性，把殷墟盗掘历史揭示清楚，也是殷墟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遗憾的是我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十分愧对前辈的期望。尽管此中有些客观原因，如随着日月流逝，当地一些殷墟盗掘的历史见证人相继过世，活资料日渐消失，加之后来我又调离了安阳，但主要还是由自己的惰性造成的。

大约是1981年秋天，夏所长来安阳考察商代玉器，郑振香同志提供了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我和杨锡璋挑选了西区墓葬出土的一些玉器，供夏所长考察。一连几天，他就在队里为他提供的一间简陋小屋中工作着。在考察工作临结束前一天，我们陪夏所长看了队里标本室和库房中一些玉器。在参观中，夏所长对每件标本都仔细观察。在看到玉戈时，他说：这些玉戈是礼器，是由实用器转化而来，因此它还具备实用器的特点。他让我们注意看玉戈的内

部与援部有一模糊的分界线，如用放大镜观察，这条凸棱线就清晰了。他还说：玉戈当时是安柄的，这条分界线就是安柄的遗痕，如用放大镜观察，内部表面还有安装木质柄时留下的磨擦痕。西区墓葬出土的玉（石）璋与玉戈一样，当时也是安有柄的。他一件件地让我们观察，玉璋的内部大都磨制得不光滑，有的只做了粗加工。

夏所长在队里只呆了三四天，他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既未发表讲话，也未下达指示，可他的身体力行则给全队同志以深刻教育。夏所长这一次安阳之行教育了我，做学问要严谨踏实，朴实无华，浮光掠影、华而不实是科学的大忌。

#### 四

殷墟发掘以1928年10月由董作宾先生主持第一次发掘为开端，至今已七十多年了。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将整个殷墟发掘划分为三个时期：1928年至1937年，为殷墟考古的开创时期；1950年至1957年，为殷墟考古的恢复时期；1958年至今，为殷墟考古的全面开展时期。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共组织了15次发掘，发掘规模宏大，收获丰富，展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殷墟发掘是完全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连续发掘长达十年，发掘面积近五万平方米，用工最多时达五百人，这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上是空前的。

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历史遗物，发现了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大型的殷王陵墓，证实了这里就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从而使商代的历史真正成为信史，为此，郭沫若曾称誉殷墟发掘是中国新史学的开端。

从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时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影响下，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疑古”之风。疑古派在怀疑主义精神指导下，全盘否定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古史体系。而被否定的中国古史又如何重建呢？疑古派学者并未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新兴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用科学的精神与实践担当起这一重大的历史责任。以李济、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用他们在殷墟考古中的科学成果，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架构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

殷墟考古所倡导的科学精神，驱散了“疑古”迷雾，使学术界耳目为之一新。

殷墟发掘使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被全面揭露出来，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在此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在 50 年代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文化和偃师二里头文化，使我们今天能够较完整地确立起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架构体系。

殷墟发掘与研究成果还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而不是从外部移植来的。梁思永先生在 1939 年所发表的著名论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通过豫北地区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对比研究，指出：后冈二层（即豫北龙山文化）“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证实了前辈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渊源于中国本土的论断是不容置疑的。

殷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殷墟考古的实践中，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形成和发展。我这样说，可能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来源于西方，是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照搬。这一看法的前一句话是对的，后一句话则不太确切。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这种以田野考古学为核心的理论与方法很快就与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近代考古学。这一时期的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它加进了中国金石学的理论与方法。

殷墟发掘的初期，发掘技术与方法还不很成熟，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归来的李济（1929 年加入殷墟发掘）、梁思永（1931 年加入殷墟发掘）参加并主持殷墟发掘以后，他们把从西方学来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殷墟考古中去，并在实践中艰苦地摸索、创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从殷墟发掘至今，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沿着先辈的足迹，在考古实践中锲而不舍地探索、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古代文化遗存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由中国的学者在考古实践中创造出的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从 20 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30 年代梁思永提出“文化元素分析法”，直至 70 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无一不是中国学者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创造与发展。

从 50 年代开始，尹达、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提出创建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宏伟目标。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核心任务，就是在中国本土的考古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我们还应该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一切先进的、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科技成果，来提高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对于今天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说来，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和继承前辈学者所创建的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发展。前几年热闹了一阵的“新考古学”，就是反对继承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他们要在中国搞“考古革命”，提出考古学的出发点是预先设计的某一个“模式”，而不是

对考古学资料的科学摄取。认为考古材料是为“验证先行假设的原理原则”而服务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任意取舍的。

夏鼐、王仲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的《考古学》一节中曾写道：“在60年代，美国兴起以L. R. 宾福德为首的所谓‘新考古学派’，主张考古学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撰造一些别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他们的主张虽然过于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考古学流于繁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省。”

“新考古学”宣传了好几年，除见了几篇晦涩难懂的文章外，并没有通过在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实践，拿出一个“新考古学”的典型成果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前面提到的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思想大解放，有人提出考古学要“大破大立”，结果破是破了，立却没有立起来。有的地方搞“考古革命”，发掘搞大探方，不分地层，陶片论斤称，挑灯夜战，多少天拿下个遗址，多少天出一本报告。这样搞的结果，必然是一场灾难。

1975年考古所里有个别人，以“反击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回潮”为号召，把矛头直指夏鼐先生。提出“考古发掘要革命”，“编写报告要革命”，夏鼐先生义正辞严地说：你们如果拿不出一个新的火车时刻表来，就还得用老火车时刻表，否则中国考古学就会被你们搞乱。

“新考古学”认为陶器排队、年代分期是见“物”不见“人”，他们企图超越考古遗迹与遗物的分析与研究，而直接进行人类社会组织与行为的研究。问题在于在田野考古中如果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摄取资料和信息，未能判断每一个文化遗存的时空关系，我们又如何去解释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呢？无论是从中国考古学史来看，还是从殷墟发掘史来看，都有一个资料积累的阶段。我们不能把对物质文化资料的分析以及分期编年和文化谱系的梳理与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理论研究截然地区分开来，或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

还有的人把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去，称为是“新考古学”，这实际上是很模糊的认识。考古学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它从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引用。中国考古学在建立和发展进程中，就曾不断地吸收和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李济、夏鼐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本人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且特别关注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在殷墟发掘和资料整理期间，李济先生先后聘请了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气象学和冶金学等有关学科的专家，参与殷墟考古的资料收集、分析、测试以及研究工作。众所周知，考古所的化学实验室、C<sup>14</sup>实验

室、热释光实验室就是在夏所长主持下建立起来的。随着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渗透与结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更新，从而使田野考古获取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这就对考古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应当指出，任何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科技手段的引用，都不能代替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学的基础是科学规范的田野发掘，严谨细致的室内整理与研究，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 五

上面谈了谈新中国成立前殷墟发掘的意义，下面简略地回顾一下新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考古中所走过的道路。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由郭宝钧先生带队奔赴安阳，重新开始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13年之久的殷墟发掘。对武官村大墓等五个地点进行勘探发掘。以此为标志，殷墟发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50年以后直至1958年，殷墟发掘时断时续，而且都是配合当地的建设工程进行抢救性发掘，目的性与计划性都不强。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做好殷墟的发掘工作，组建了安阳工作队，由尹达所长亲任队长。安阳队的建立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殷墟考古工作，加强殷墟文化的研究，起了组织保证作用。

1958年至1961年，安阳队对小屯北地、苗圃北地、大司空村等13个地点进行大规模发掘。通过发掘，初步摸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并根据明确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排队，首次提出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

围绕着“殷墟的范围与布局”以及“殷墟文化的分期”这两个课题，安阳队在此后数年连续工作，获得了更多的考古学资料，使这两个学术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9年在苗圃北地发现了一处大型商代铸铜遗址，为了全面揭露该遗址，从1959年至1984年，安阳队在该地开展了十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并在探讨商代青铜铸造手工业状况以及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的15次发掘资料（包括文物标本、文字记录、照片、图纸）全部运往台湾，而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作重点地区是在小屯宫殿区和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如果没有原先的发掘总平面图及相关资料，而在同一地点开探方搞发掘，必然会引起混乱。为此，当时尹达所长对殷墟发掘有一个指导性意见：小屯宫殿区和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暂不做发掘，等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原有的图纸、资料都拿回来了，该地区工作才可按序进行。安阳队今后的田野工作主要方向应放在殷墟

的周边地区。由于宫殿区和王陵区内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当时有个别同志曾大胆地闯入禁区去搞发掘。这件事很快被所里知道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冒这个险了。

1960年以后直至1975年，安阳队先后发掘了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殷墟西区、小屯西地和南地、后冈等地的遗址和墓葬，其中以1973年对小屯南地的发掘收获最大，共发现了五千多片甲骨文，找到了甲骨文与陶器共存的地层关系，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1976年春，安阳队的同志经过了充分酝酿和认真的勘察准备，大胆地冲破禁区，同时在小屯北地和武官村北地展开了发掘。在小屯北地发现了妇好墓，在武官村北地发掘了近二百座祭祀坑。这两项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妇好墓和王陵区祭祀坑的发掘与研究成果，说明安阳队在殷墟发掘中所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正确的。从1976年起直至1987年，安阳队连续在宫殿区附近和王陵区进行钻探发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迹，并将新中国成立前所发掘的西北冈大墓坑位找出，统一绘制出整个王陵区的平面图。这些工作对于重新认识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的范围与布局，进一步推动殷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新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考古中作出了很大成绩。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无论是田野发掘水平，还是学术研究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在肯定成绩时，还应该看到不足，而只有找到不足，才能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工作。我个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工作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目的性、计划性不强，没有制定出一个长远的发掘和研究规划；第二个是我们在揭露文化遗存，探讨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忽视了人与地的关系考察与研究。人与地的关系是很广泛的，它包含人类生存空间的生态环境，人对天地、山川以及动植物的认识与利用。它既包括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亦包括人类的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的形成。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为考察人与地的关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料，尽管我们曾邀请过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冶金史专家来殷墟做考察工作，从事合作研究，但是应该承认，这方面工作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更细致地、更多地去收集地下所埋藏的实物资料，并从其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是今后殷墟考古应该努力去做的。

与全国其他同类遗址相比，今天的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已基本廓清，殷墟文化的年代与分期在考古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殷墟出土的主要文化遗物，如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器等，学者们都曾进行过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及制造工艺的考察。殷墟所揭示的各类文化遗迹，如房子、窖穴、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等，考古学家都

曾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殷墟出土的 15 万片甲骨文，以及近百年来甲骨文研究的丰硕成果，对殷墟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前人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为今后的殷墟考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安阳队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在安阳还存在着了一支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与考古队配合默契的技工队伍，他们将是今后殷墟考古的主力军。

殷墟考古的基础好，起点高，但殷墟考古未来的任务也是艰巨的。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安阳殷墟还有很多地点没有挖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殷墟考古应该搞一个规划，以后应有计划地去组织实施。

殷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做好殷墟的考古工作，首先应做好殷墟的保护工作。殷墟的保护现状实在令人堪忧。1986 年我离开安阳时，当时殷墟的保护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1998 年 10 月当我再一次回到安阳，见到殷墟地面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横贯殷墟南部东西的安钢大道两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位于殷墟西区的安阳钢铁厂突破了 1980 年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河南省人民政府三家商定，并报国务院批准的钢厂的东界（从孝民屯南地至白家坟西地），快速向东、向北发展。该厂目前的东界距小屯村已不到一公里。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钢厂一到，一切皆乱，古文化遗址将万劫不复。目前在整个殷墟 30 平方公里的遗址保护范围内，保护得比较好的就剩下王陵区、宫殿区和后冈遗址这三个重点文物保护区了。即使这三个重点保护区，也因为近郊农村人口的膨胀，民居的兴建，村落的扩大，而逐渐被蚕食。如此严重现象，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大约再过十年，这座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将不复存在。因此笔者在这里向安阳市人民政府、向安阳市人民呼吁，为了民族，为了子孙后代，也为了安阳市的未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殷墟——这一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 目 录

前 言	(1)
壹 殷墟的范围与布局	(1)
一、殷墟的范围	(1)
二、殷墟的布局	(4)
(一) 宫殿区	(5)
(二) 居住遗址	(10)
(三) 手工业作坊遗址	(11)
(四) 墓葬区	(12)
三、殷墟遗址的性质	(13)
贰 殷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22)
一、殷墟文化的分期	(22)
二、商代纪年	(24)
叁 殷墟的建筑遗存	(28)
一、宫殿宗庙基址	(28)
二、殷墟的排水设施	(35)
三、房屋建筑	(42)
(一) 地穴式房屋	(42)
(二) 半地穴式房子	(46)
(三) 地面中小型建筑	(48)
(四) 宫殿建筑	(50)
肆 殷墟的墓葬	(55)
一、带四个墓道的大型墓	(55)
二、带一二个墓道的大型墓	(59)
三、长方形竖穴中型墓	(66)
四、长方形竖穴小型墓	(71)
五、无墓圻墓	(73)
六、族墓地	(74)
七、小型墓墓主身份的探讨	(77)



八、关于“异穴合葬” .....	(80)
九、墓上建筑 .....	(83)
十、关于“墓上封土”的讨论 .....	(93)
<b>伍 殷墟的祭祀坑</b> .....	(97)
一、王陵区的祭祀坑 .....	(97)
(一) 埋人的祭祀坑 .....	(98)
(二) 埋动物的祭祀坑 .....	(100)
(三) 埋器物的祭祀坑 .....	(103)
(四) 人牲的身份分析 .....	(103)
(五) 人殉与人祭的区别 .....	(105)
二、宗庙附近的祭祀坑 .....	(108)
三、其他地点的祭祀坑 .....	(112)
<b>陆 殷墟的车马坑</b> .....	(119)
一、车子遗迹 .....	(119)
二、车子的结构 .....	(130)
三、车马坑遗迹分析 .....	(136)
四、殷代车子的起源 .....	(146)
<b>柒 殷墟的青铜器</b> .....	(153)
一、青铜礼器的组合 .....	(153)
(一) 甲类墓的铜礼器组合 .....	(153)
(二) 乙类墓的铜礼器组合 .....	(155)
(三) 丙类墓的铜礼器组合 .....	(158)
二、青铜方鼎 .....	(160)
(一) 方鼎的名称与用途 .....	(161)
(二) 方鼎的分型与分期 .....	(163)
(三) 方鼎的演变规律与穆王的礼制改革 .....	(167)
(四) 方鼎所有者的身份 .....	(170)
三、青铜钺 .....	(181)
(一) 青铜钺的分类 .....	(181)
(二) 青铜钺的用途 .....	(185)
四、青铜铲 .....	(189)
<b>捌 殷墟文化几个问题的讨论</b> .....	(193)
一、殷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 .....	(193)
(一)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对殷墟文化的影响 .....	(195)